

论《小说月报》翻译文学 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端传妹

内容提要 《小说月报》(1910—1931)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文学刊物之一,经历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发生。本论文通过对《小说月报》前后期翻译文学的研究,从编辑动机、翻译语言和翻译文学主题三个方面,对翻译文学如何参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发生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 《小说月报》 翻译文学 现代文学 茅盾 郑振铎

端传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210097

《小说月报》(1910—1931)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发行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纯文学刊物之一。以1921年茅盾接手进行改革分为前后期,《小说月报》全部22卷262期一共发表了约1500种译作,占期刊文章总数的近一半。它经历了清末民初旧文学向五四新文学的历史转变,其主编虽数次更迭,但对翻译文学的重视和借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积极构建却始终如一。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化冲突导致的。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将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分为两类,一是“早发内生型”,如英、美等国,其现代化进程源于本国社会发展的内部需求,是自身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二是“后发外生型”,其现代化进程的动因主要来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启示效应^[1]。1840年被炮火轰开国门的中国,自然属于后者。作为“后发外生型”的中国,在现代性的引领下,传统的文学观念、价值取向等发生了崩塌,翻译文学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参与到中国文学向现代转型的进程之中。《小说月报》从1910年到1931年的翻译文学,以完整的形态展现了这一转变过程,为我们细致了解现代文学的发生提供了鲜活的“历史化石”。

一、前后期《小说月报》对翻译文学的态度

从1910年到1931年,《小说月报》主要经历了五任主编。这五任主编中,有四位“大家”——恽铁樵、茅盾、郑振铎、叶圣陶。一刊四家,反映出《小说月报》拥有高素质的编辑群体,他们自身的中西学养,使得翻译文学在参与现代文学发生之时对中国文学起到了积极的建设作用。

以1921年为分界,前期《小说月报》的主编是王蕴章(1884—1942)和恽铁樵(1878—1935)。受晚清

[1]参见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小说杂志定位及风格的影响,王氏工诗词骈赋,晓戏曲,擅创作,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小说月报》创刊之时,梁启超的影响已经变小,小说的娱乐消遣功能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得到强化。王蕴章旧式文人的文学偏好与借助翻译文章打开时人眼界的理想构成了其翻译动机。1910-1912年,《小说月报》除了林译小说及嘯天生、泣红等人意译的几部短篇小说和“新剧”外,大量的篇幅用来刊登世界各地的奇闻逸事、风土人情和最新资讯,展示西方社会的风俗人情、世态万象,而文学雅趣的追求仍然放在诗词、笔记、序跋等中国传统文学之中。域外作品的文学价值尚未进入编辑视野。1918-1920年间,恽铁樵离职,王蕴章再掌主编之职时也曾试图努力跟上时代的脚步,发表了包括托尔斯泰、莫泊桑、雨果、易卜生、左拉、契诃夫等名家之作,但终因其落后于时代的文学观念而被淘汰。

恽铁樵主编《小说月报》的六年时间(1912-1917),以开阔的编辑视野和文学修养对翻译文学如何作用于中国文学进行了全面的思考与实践。有读者这样评价恽铁樵主编的《小说月报》:“《小说月报》自先生主持笔政后,文调忽然一变。窥先生之意,似欲引观者渐有高尚文学之思想,以救垂倒之文风于小说之中。”^[1]恽铁樵正是借助于翻译文学完成了小说“文调”的改变,大量社会改良主题的翻译作品为读者“引入高尚的文学思想”,对翻译作品在艺术上严格把关以救当时“垂倒之文风”。

在翻译动机上,恽铁樵将翻译文学视为严肃的创作,倡导社会小说。“今也社会改良之声,与文学进步之论,双方并进。译著小说者,非复借是以牟私利,而将借以濬发民智,启迪愚蒙……”^[2]文学进步与社会改良相提并论,这一观点和新文学的主张已经非常一致。

恽铁樵虽重视小说的社会改良功能,但并没有将这一思想口号化,而是通过追求翻译作品写实的文风和雅驯的文字来实现。从小说类型看,恽氏主编的72期《小说月报》,言情、侦探类的译作约占10%,社会小说、历史小说所占比例高达90%,这一比例和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已没有太大区别——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关注成为一致的追求。恽氏主编期间发表短篇文言小说多达332篇,表现出他努力以雅驯的文言文这一传统的文学载体,借助短篇小说短小精悍、及时反映现实的体裁,将传统文学“文以载道”之功能与域外小说切实关注社会的功能相结合的追求。

后期《小说月报》的三位主编是茅盾(1896-1981)、郑振铎(1898-1958)和叶圣陶(1894-1982)。作为文学研究会同仁,他们都是新文学的倡导者,对新文学有着共同的追求。1921年受命于《小说月报》低谷时期的茅盾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之成为五四以后从事新文学建设的第一个大型文学刊物。时年25岁的茅盾与其说是一位成熟的编辑不如说是一个充满理想的革命者。受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茅盾提出:“(我以为)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指其是要有普遍性的,所以我们要用语体来做;唯其是注重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所以我们要注重思想,不重格式;唯其是为平民的,所以要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光明活泼的气象。”^[3]可是在当时,与旧文学决裂的新文学在文学思想、文学语言、艺术技巧等方面都处于“真空”期。于是,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以一种“排山倒海”式的力度,全方位地介绍西方思潮、作家作品、理论批评等。借助翻译作品,茅盾完成了《小说月报》现代文学的基本转型,确立了西方文艺思想的典范地位。

以翻译俄国文学走上文学之路的郑振铎是位学者型的编辑。他重视翻译文学,但和茅盾不同,他更注重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进行反思和研究,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时更注重艺术标准而非政治诉求。郑氏编写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文学大纲》,涵括了从荷马史诗、圣经故事、希腊神话、诗经楚辞一直到19世纪中国在内的各国文学。此外,郑氏主编时期还多次发行外国作家作品的“专号”,如“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等,真正做

[1]陈光辉:《陈光辉先生来函》,《小说月报》第7卷1号,1916年1月。

[2]管达如:《说小说》,《小说月报》第3卷10号,1912年12月。

[3]冰(茅盾):《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小说月报》第11卷1号,1920年1月。

到了从艺术本质出发,不分国家不分民族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世界文学的成就,普及世界文学知识。郑振铎以自觉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视野,主张打破横向的国界限制和纵向的历史年代限制,从宏观上、总体上把握小说的艺术属性及其在整个文学史上的地位,为新文学青年树立了宏阔的世界文学观。

郑氏主编时期,《小说月报》在翻译西方作品、构建新文学西方范本的同时,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学资源的研究和整理。这种研究和整理不是旧学的简单“回归”而是用一种世界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学,其将传统考据与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相结合,树立了现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学术范式。郑振铎本人的学者气质,对小说艺术理论的书写,对“血和泪的文学”的积极呼吁,都从源头上影响了现代文学的发生。

叶圣陶主编期间,将《小说月报》的重心从翻译转移至创作。随着“为人生”的创作观点的深入,西方理论范式的建立,翻译文学已经与新文学创作的观念、视角、主题和语言,与新文学的发展融为一体。

纵观五位主编对翻译文学的态度,前期因传统文学的地位尚未动摇,翻译文学还处于边缘地位。虽然恽铁樵已经通过翻译文学改良传统小说娱乐为主的功能,但本质上还是在传统文学的大格局内对小说地位的调整。这种调整既保留了读者以文言为主的阅读习惯,又使《小说月报》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潮流,读者群体得以不断扩大,在文学和商业之间获得了很好的平衡。后期《小说月报》的定位转向纯文学期刊。茅盾时期以翻译文学为中心,构建新文学的理论范式和创作技巧,全力以欧化语体文介绍西方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和西方文艺理论,原有的“俗”文学的读者大量流失。对中国新文学建设而言,翻译文学不能替代本民族文学,新文学的建设需要的是郑振铎式的建设态度——引入西方文学的理论和批评方法,以中国文学为新文学建设的最终旨归。从郑振铎到叶圣陶,《小说月报》完成了期刊从一般的文学读物到新文学“温床”的转型,一大批新文学的重要作家和作品的出现,才真正确立了《小说月报》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二、从“文言”到“欧化体白话”

语言是文学和翻译最基本的问题。翻译语言由文言变为白话,是新旧翻译文学的一个分水岭。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是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为标志的。《小说月报》的翻译文学完整经历了这一历史过程。将文学语言从文言改为白话,这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形式的改变,它预示着新文学对文学话语权的抢占,目的是使新文学能更好地传达现代人的思想和情感。

前期《小说月报》的翻译语言大致分为文言和白话两类,呈现出文白混杂的特点。文言翻译的代表人物是林纾和恽铁樵。以古文家自居的林纾,以古文写作的方法来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纾不通西文,然每听述者叙传中事,往往于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大类吾古文家言。”^[1]他善用《左传》、《史记》等史传文学中常用的刻画人物、情节设置的方法与技巧来处理西方文学作品,实际上是在古文中找到与西方小说叙事技巧的契合点。在翻译语言方面,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里面已经做过客观公正的论述:“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2]正是因为林译小说在古文基础之上多种词汇语料的综合运用,使得林译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林译小说使得俗文学可以向雅文学靠拢,从而使小说在中国的文学地位得到有效的提升并培养了新文学的第一批读者和作家。

[1]林纾:《〈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林纾选集·文诗词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8页。

[2]钱钟书:《林纾的翻译》,《钱钟书论学文选》(第六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页。

恽铁樵对小说语言有着较高的要求,他择稿的标准是:“文字不拘浓淡,体例不拘章回笔记,文言白话,惟以隽永漂亮为归。”^[1]文言“隽永漂亮”可以理解,白话也要做到“隽永漂亮”则需要翻译者具有较高的文言修养。恽铁樵认为译者若“无古书为之基础,则文法不具。文法不具,不知所谓提挈顿挫,烹辣垫浅,不明语气之扬抑抗坠,轻重疾徐,则能感人者几何矣”^[2]!恽氏理想的翻译语言是借助“文言”语符这种“典雅”的语言,改良规范白话中俗的成分,发挥其“状琐屑事物”的特点。

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正统的文人视翻译西方小说为屈尊纡贵之举,具有很高文言修养的翻译作者其实数量有限。林纾虽被后人诟病无数,也还是中国翻译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物。恽铁樵也认识到:“今之撰小说者,类于文学上略有经验;译小说者多青年,下笔苦不腴润。大多数如此,实为阅者不欢迎译本之最大原因。”^[3]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如果不能在文字上吸引读者,其它的都是妄谈。于是,以包笑天、周瘦鹃等鸳鸯蝴蝶派所使用的,糅合了古白话、民初口语和欧化白话的白话文成为主流的翻译语言。和文言相比,这样的白话文更容易为市民读者接受,也更容易接纳欧化的新名词和新句式,在翻译难度上较之文言要容易很多。前期《小说月报》上的白话翻译作品和当时大量的白话翻译作品一起对中国“超稳定”的文言书面系统造成巨大冲击,“虽然还不足以形成变革,但已经最大限度地挑战了古代汉语的弹性空间。”^[4]

正是延续这种新体白话风格,现代白话文才渐渐成熟,确立其正宗地位。毫不夸张地说,翻译文学对白话语体的要求促进了白话文的形成。严家炎先生认为:“新体白话是由面对民众的文学翻译逼出来的。”^[5]笔者深以为然。从后期《小说月报》的改革看,翻译文学是茅盾等人构建新文学的“手段”,大量不同国家、不同风格、不同思想的作品在翻译时需要更丰富的词汇、更多元的语言风格和更多层面的思想表达。正如郑振铎所指出的:“中国的旧文体太陈旧而且成滥调了,有许多好的思想与情绪都为旧体文所拘,不能尽量的精微的达出。”^[6]可见,白话文的出现,尤其是欧化白话文的出现是新文学的必然。仅以欧化白话文而言,为新文学的转型从以下两个方面提供了可能:

第一,欧化白话文的出现使得翻译文学的译法从前期混乱的状态统一为“直译”,郑振铎借用英国翻译家泰特勒(A.E.Tytler)的理论,指出:“一、译文必须传达出原作的意识。二、著作的风格与态度必须与原作的一样。三、译文必须含有原文中所有的流利。”^[7]要想达成这样的翻译目标,翻译语言是重要的工具。前期《小说月报》受语言的限制,游记、戏剧、新闻报道等不同体裁的作品被翻译成小说。如林纾把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7卷2号)由剧本改为叙述体小说,易卜生的名剧《社会柱石》(11卷3号)被瘦鹃译成小说。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人物台词为情节推动的戏剧需要使用大量的口语,而文言与口语之间的天然隔阂使得翻译的时候不能得心应手,最后以追求情节牺牲对话的方式完成翻译。革新之后,欧化白话文自由的语言为不同的文体翻译提供了可能。后期《小说月报》翻译文学的文体明确,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文体概念明确,篡体翻译的现象再没出现。以13卷7期上冬芬(茅盾)译的匈牙利莫尔奈的独幕剧《盛宴》来看,剧本的格式如剧中人物、时间、地点、布景,和人物台词等已和今天的剧本几乎没有区别。剧本开头的布景介绍:“大富翁别墅的会食堂。幕升,见有七人围坐在长桌旁,桌子位于食堂的中央。酒馐刚刚撤去,舞台后方有一扇大门,门后是一派精致的房间……一切陈设极奢侈华丽。”除了“会食堂”、“酒馐”这样的词汇略微生涩外,其他语言和

[1]《本社启事》,《小说月报》第七卷第三号、第九号,1916年。

[2]恽铁樵:《小说家言》,《小说月报》第6卷6号,1915年6月。

[3]铁樵:《论言情小说撰不如译》,《小说月报》第6卷第7号,1915年7月。

[4]石晓岩:《重构与转型:小说月报(1910-1931)翻译文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4页。

[5]严家炎:《“五四”新体白话的起源、特征及其评价》,[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

[6]郑振铎:《语体文欧化之我观》,《小说月报》第12卷6号,1921年6月。

[7]郑振铎:《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小说月报》第12卷3号,1921年3月。

今天的已无区别。开场人物独白：“我的心如刀割了；心儿战栗了，全身的细胞都战栗了！”将人物的心理状态直接呈现给读者，这不能不归功于翻译语言的革新。

欧化白话文还为散文诗——这一兼具诗与散文特点的抒情文学体裁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以法国作家波特来耳(即波德莱尔)的散文诗《窗》(13卷3号)为例，第一段译文：“从开着的窗看进去的人，绝不比看那合着的窗的人所见之多。世上再没有东西更深奥，更神秘，更丰饶，更幽暗，或更眩目，过于烛光所照的窗了。你在日光中所能见的，常不及在窗玻璃后所演了的更有趣。在那个黑暗或光明的孔中，人生活着，人生梦着，人生辛苦着。”用“深奥”、“神秘”、“幽暗”、“眩目”从不同的层面修饰“烛光所照的窗”，用富于哲理的语言抒发情怀，表达对人生的感受，“活着”、“梦着”、“辛苦着”。这样新鲜的表达和丰富的意蕴是文言难以传达的。

第二，欧化白话文一方面带来了大量音译的外来词，出现了由单音节词为主向多音节词为主的转变，另一方面形容词和副词的出现使得现代汉语的表达更细致传神，使得译文得以忠实地表现原作的风格。以郑振铎翻译的俄国作家安特列夫的《红笑》为例。小说的开头描述的是一个疲惫不堪的战士在行军时的感受：“天气是十分的酷热。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度——一百二十度，一百四十度，或者以上——我只知道热气是不止的，无望的稳定与深入。太阳是如此的可怕，如此的凶迫与可诧懼，似乎地球已移近了太阳，似乎不久全个地球便要在他无怜恤的光燃中烧却了。我们的眼睛已不能见物。”^[1]从译文中，读者可以体会到原作的风格。郑振铎的翻译将士兵深刻绝望的情绪和疲惫痛苦的感受表达得淋漓尽致，“无望的深入与稳定”描述热气，“如此的凶迫与可诧懼”描述太阳，“似乎不久全个地球便要在他无怜恤的光燃中烧却了”描述天气的酷热。这些形容词、句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是文言文翻译难以实现的。

综上所述，欧化白话文促进了现代白话文词汇和语法的变革，与新白话文一起，最终为新文学的思想内涵和文体风格带来了新气象。面对大量蕴含新思想、新艺术风格的翻译作品，如果不采用欧化语体，将无法准确传递西方文学的原貌，了解西人的思想。欧化词汇、句法、结构提供了表达现代思想和情感的途径，它不仅是翻译文学的需要，也为国人表达现代意识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工具。

三、《小说月报》翻译文学对现代文学发生的作用

翻译文学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参与了《小说月报》的现代转型，并通过《小说月报》的传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下面择其要者论之。

首先，借由大量西方文艺创作思潮和理论的翻译，新文学“为人生”的主张获得了有力的理论支撑；通过对俄国文学和被损害民族文学的介绍，相似的社会背景及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心理使得其文学创作的经验和成就成为新文学借鉴和效仿的对象。

茅盾主编《小说月报》的两年期间，共发表了评论翻译作品6篇、文学史翻译作品37篇、作家研究翻译作品6篇，表现出浓厚的理论色彩。在创作理论上，茅盾在西方众多的创作理论中选择了自然主义。他从庞杂的自然主义理论中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新文学的需求提出了“写实”和“关注社会问题”，为“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新文学确立了理论基础。

在具体的文学作品翻译方面，茅盾通过发行“被损害的民族文学号”和“俄国文学研究专号”，有意识地为新文学的创作者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在“被损害的民族文学号”中，东欧各国如波兰、捷克、塞尔维亚、芬兰、新犹太，甚至立陶宛、莱多尼亚、爱沙尼亚这样的小国的文学第一次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茅盾在《序言》中指出：“凡被损害的民族的求正义求公道的呼声是真的正义真的公道。在榨床里榨过留下来的人性方是真正可宝贵的人性，不带强者色彩的人性。……因为由此我们更确

[1][俄]安特列夫：《红笑》，郑振铎译，《小说月报》第15卷7号，1924年7月。

信人性的砂砾里有精金,更确信前途的黑暗背后就是光明!”^[1]对弱小国家文学价值的发现与尊重,无疑对同样处于弱小和被损害地位的中国读者起到了安慰与鼓励的作用。

革新后的《小说月报》还以号外的形式隆重介绍了俄国文学。《俄国文学研究》一期就发表了20篇论文,涉及文学史、文艺理论、作家研究、作品分析、文类研究、艺术批评等多方面内容;选译了29篇作品,普希金、高尔基、柴霍甫、屠格涅夫、高尔基、库普林、安得列夫等几乎所有俄国著名作家的作品都出现了,此外还有赤色诗歌《国际歌》和三篇赤色小说。这样大规模、系统全面地翻译介绍西方文学势必给读者带来巨大的震撼,也极大地激发了新文学的创作者们。鲁迅曾回忆说:“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2]

茅盾之所以青睐俄国文学,是因为“俄国近代文学的特色是平民的呼吁和人道主义的鼓吹”^[3]。渴望以文学实现社会改造的茅盾,在俄国文学那里找到了实证:俄国与中国国情的相似性使得新文学的建设者们有理由相信俄国文学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未来;俄国文学所包含的丰富人性给新文学“人”的书写提供了足够的想像和表达空间;俄国文学强烈的政治色彩和人道主义精神成为新文学的追求。可以说,俄国文学为新文学的转型提供了参照和资源。

第二,与前期《小说月报》相比,后期《小说月报》对新文学的独特贡献在于构建了现代儿童文学的理论与实绩。刘纳在《论“五四”新文学》一书中将“童心美”视为“五四”新文学作品的主要审美特征,可见儿童文学之于五四的重要性。郑振铎本人对儿童文学的重视,使得他任主编期间开始大量翻译外国儿童作品,创建中国自己的儿童文学。

五四“儿童文学”的出现是和“发现儿童”直接相关的。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中指出:“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整的个人,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4]可见,儿童的发现是和五四时期“人”的发现紧密相关的。

郑振铎从15卷1号至18卷1号,设“儿童文学专栏”,并在1925年的第8、9两号连续刊登《安徒生号》。期间共发表寓言、神话和童话作品81篇,安徒生童话、拉风歹纳(拉封丹)寓言等今天仍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作品就是在那时介绍到中国的。郑振铎在介绍安徒生时说:“他的伟大就在于以他的童心和天才开辟一个童话的天地,给文字以一个新的式样与新的珠宝。他所用的文字是新的简的如谈话似的文字。当他动手写童话之前,先把童话告诉给小朋友听,然后才写在纸上,所以能创出一种特异的真朴而可爱的文体。……‘有天才的人还要有勇气’,这是勃兰特在他的安徒生论上起首的一句话。”^[5]以童心和天才,用平易的语言创造真朴可爱的新文体,这既是郑振铎对安徒生的介绍,也是对新文学创作者们的期许。在域外儿童文学作品的影响下,新文学的儿童文学创作迎来了自己的春天,鲁迅、叶圣陶、郑振铎等几乎所有现代文学大家都参与到了现代儿童文学的翻译与创作当中来。

笔者认为,五四时期对儿童文学的重视其意不仅指向儿童文学而在整个民族文学,儿童文学的翻译也是“为人生的文学”和“血与泪”文字的组成部分。对儿童弱势地位的关注,对儿童天性的发现其实是为“人”的发现提供佐证。鲁迅回忆自己翻译爱罗先珂童话的初衷是曾坦言:“不过要传播被

[1]记者:《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引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0号,1921年10月。

[2]鲁迅:《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鲁迅选集》第七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3]冰(茅盾):《俄国近代文学杂谈》,《小说月报》第11卷第1、2号,1920年1、2月。

[4]周作人:《儿童的文学》,《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5]西谛(郑振铎):《卷首语》,《小说月报》第16卷第8号,1925年

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1]。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域外儿童文学作品的参与,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将会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第三,泰戈尔作品的翻译直接影响了新文学诗歌与散文的发生。印度作家泰戈尔是后期《小说月报》被译介最多的一位作家,这既是由于郑振铎本人对泰戈尔的偏爱也是其作品所蕴含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决定的。1921年-1923年间,郑振铎就在《小说月报》上先后发表了泰戈尔的《园丁集》、《新月集》、《吉檀迦利》等作品。泰戈尔访华期间,《小说月报》发表了大量的介绍其思想和著作的文章,并连续推出两期《泰戈尔号》。泰戈尔作品中浓厚的世界大同思想、爱的哲学、人道主义精神等给当时的新文学读者提供了多种接受的可能。冰心在文章中说:“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2]徐志摩认同其“梵我合一”的“和谐”美学。郑振铎在《太戈尔传》中说:“他的诗正如这天真烂漫的天使的脸;看着他,就知道一切事的意义,就感到和平,感得安慰,并且知道相爱。”^[3]张闻天的三篇介绍泰戈尔的文章分别从“自然之美”的诗学观、将妇女视为“爱的化身”的女性观、人道主义思想出发介绍了其思想特点。王统照在《太戈尔专号》上发表了长文,全面论述了其“爱”与“美”的哲学思想。

这些泰戈尔的评论者和研究者在思想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其诗风与思想的影响。冰心的儿童文学创作,徐志摩和郭沫若的现代诗创作,张闻天、许地山和王统照的散文创作,这些现代文学的重要成果无不受益于泰戈尔。新文学的发生由于泰戈尔的影响,在浓厚的政治色彩之上多了一份爱与温情。泰戈尔作品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获得了新文学读者的认同,其自由的语言形式也激发了新文学作者的强烈认同,新文学作者在打破旧有的语言束缚后,散文成为新文学最有成就的文体之一。

第四,新文学戏剧的转型从语言、内容到艺术技巧无不受益于翻译文学。以戏剧为改良社会的艺术形式,在前期《小说月报》就获得了重视。革新后的《小说月报》通过57部翻译剧作从戏剧内容到艺术技巧帮助中国戏剧完成了现代转型。后期《小说月报》翻译戏剧的视野尤为开阔,俄国的安得列夫、英国的王尔德、比利时的梅德林(梅特林克)、法国的莫里哀、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印度的泰戈尔、英国的拜伦、萧伯纳、德国的霍普特曼和挪威的易卜生等戏剧名家的作品都被全面介绍进来。

在艺术技巧上,不同风格的翻译作品为新文学读者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如比利时表现主义作家梅特林克的《马兰公主》、《群盲》等运用象征、暗示、隐喻的表现手法表达对人自身命运的思考。在西方翻译剧作的推动下,现代戏剧由传统对戏剧情节的重视转为关注重视人物内心和精神层面的变迁,最终完成了其现代转型。

结 语

从《小说月报》的翻译文学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翻译文学与新文学的发生不是简单的接受—影响的线性关系。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翻译文学确实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而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诉求通过编辑群体、读者群体和创作群体决定了我们对翻译文学的选择、理解、接受的范围和程度。后期《小说月报》通过翻译文学,以几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道路,自然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等众多文艺思潮被介绍至中国并运用到创作实践之中。新文学的理论倡导者、创作者和读者对翻译文学不同的选择、理解和接受共同塑造了新文学。对《小说月报》翻译文学的研究展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是一个继承与创新、汲取和转化的有机过程。

[责任编辑:平 啸]

[1]鲁迅:《坟·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6页。

[2]冰心:《遥寄印度时人泰戈尔》,《冰心散文集》,北新书局1932年版。

[3]郑振铎:《太戈尔传》,《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1922年2月。